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总主编 冯克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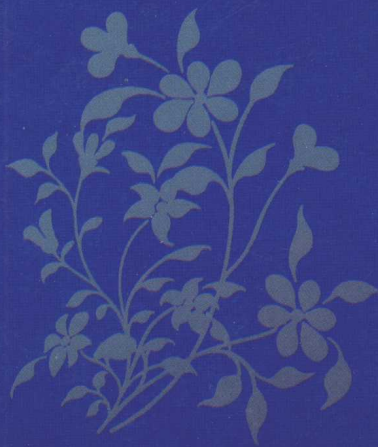


(第四辑·第十三卷)

[清]康有为

(1858年~1927年)

改良维新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学苑音像出版社

G40
275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第四辑·第十三卷)

[清]康有为
(1858年~1927年)

改良维新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四辑/北京师联教育科学
研究所主编.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5

ISBN 7-80135-740-X

I. 中... II. 北... III. 教育名著-作品综合集-中
国文学 IV.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429 号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四辑

[清]康有为改良维新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学苑音像出版社

★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200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1/32 印张:195 字数:5066千字

ISBN 7-80135-740-X

全二十册定价:526.00元(册均26.30元)

(ADD: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10号信箱)

P. C.:100024 Tel:010-65477339 010-65740218(带Fax)

E-mail:webmaster@BTE-book.com Http://www.BTE-book.com

教师必读文库
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出版说明

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教师职业素质素养达到基本要求和提高,是当前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急迫要求。为此,我们组织相关专家重新系统地、较完整地遴选、编译、评注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

1. 从古至今,各时代、各地区和国家有代表性,和对当代及后世教育发生直接影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经典论述。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影响,同时,对现实教师的成长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作为职业教师,总听说、总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著作是我们这次系统编选的重点。

2. 全套分中国卷100种、外国卷100种,每二十种为一辑,共十辑,约200种,同时出齐。每种含教育家的生平、教育事迹、教育成就、教育思想评析和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及注解解读导读两部分。这对于全面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运用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是十分有益的。

编者

2006年4月

目
录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第四辑·第十三卷

[清]康有为改良维新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上 篇

康有为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

维新主帅康有为	(1)
(一)苦习经书 立志求国	(1)
(二)投身变法 报国图强	(8)
(三)七上清帝书 吁清维新变法	(11)
(四)“百日维新”与保皇生涯	(20)
(五)博论宏宏光照寰宇	(26)
生平和著作	(32)
“万木草堂”的讲学和著述	(39)
改良维新的教育主张	(45)
(一)变科举、废八股	(45)
(二)兴学校、育人才	(46)
(三)派游学、译西书	(47)
(四)倡平等、重女教	(49)
《大同书》中关于教育的理想	(50)
康有为的“孔教”思想	(54)
(一)康有为提出孔教说的动因	(56)
(二)康有为孔教说的目的	(57)
(三)康有为孔教说的内容剖析	(59)

(四)康有为孔教说的价值	(65)
(五)近现代“儒教是教说”的发展、演化轨迹	(66)
康有为晚年的尊孔读经活动	(68)
教育思想体系	(70)
(一)主张把教育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	(70)
(二)提倡变科举、兴学校,建立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	(72)
(三)要求以西学作为各类学校的主要课程	(77)
(四)重视女子教育和师范教育等专业教育	(79)
(五)鼓励派留学生,翻译西书	(82)
(六)《大同书》中的教育理想	(85)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	(89)

下 篇

康有为教育论著选读

《大同书》《去家界为天民》部分	(95)
第三章 育婴院	(95)
第四章 小学校	(98)
第五章 中学院	(100)
第六章 大学院	(102)
康有为等:公车上书(节录)	(105)
附:《大同书》教育思想评析	(108)
康有为《长兴学记》(节录)选读	(116)
附:卢湘父:万木草堂学风	(129)
《万木草堂口说》	(137)
学术源流(一)	(137)
学术源流(二)	(141)

学术源流(三)	(145)
学术源流(四)	(148)
学术源流(五)	(151)
学术源流(六)	(155)
学术源流(七)	(157)
《康子内外篇》选读	(163)
康子内外篇	(163)
学 记	(191)
公民自治篇	(211)
辨革命书	(232)
《官制原理篇》	(241)
法国革命史论	(245)
跋	(262)
饮冰附识	(264)

维新主帅康有为

(一) 苦习经书 立志求国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夏,号长素,晚号更生或更牲,还自号天游化人,游存叟、游存父等。因是广东南海县人,人们尊称为康南海或南海先生。1858年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银塘乡。康有为属于官宦书香世家的后代。高祖康辉,曾诰封荣禄大夫,官拜广西布政使;曾祖康式鹏,讲学于乡里,是名闻一方的酸儒;祖父康赞修,担任过连州教谕,十分推崇程朱理学,在广东文人中颇有声望;叔祖康国器,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受命广西巡抚。到其父亲康达初时,家运开始衰败,仅官至江西的补用知县。康有为对自己的家世十分自豪,自称“吾家自九世祖惟卿公为士人,至于吾为二十一世,凡为士人十三世矣”(《康南海自编年谱》后简称“年谱”)作为长子的康有为自幼聪明,5岁时就能背诵唐诗数首。6岁拜师简凤仪,系统学习《大学》、《中庸》、《论语》和朱注《孝经》等书,7岁时就已经能写文章了。康有为学习专心致志,十分用功,无论多么难读的经书,他只要诵读几遍,就能背诵如流。由于康有为读书过目不忘,颇能强记,悟性又好,故老师十分喜欢他,远近不少人都知道,在银塘乡有位了不起的“神童”。也许是自幼受家庭的影响,也许是经书已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扎根,康有为少年老成,不苟言笑,“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梁启超《康有为传》)言必称圣人。难怪乡里的亲友们送给了他一个雅号:“圣人为”。的确,还在孩童时期,康有为就已树立了远大志向。一次,父辈们来到康有为的书房,想了解他的学习情况,有意考

一考他的才学。时值屋外柳絮纷飞,有人顺口便出“柳成絮”三字,让康有为答对。小小年纪的康有为不假思索地对以“鱼化龙”三字。此对不仅对仗工整贴切,而且也反映出了康有为的宏大志向,难怪当时父辈中就有人叹曰:“此子非池中物。”(年谱)

11岁时,康有为父亲康达初积劳成疾,中年早逝。母亲劳氏从此寡居,独立担当起抚养子女的责任。由于家境日继,全家只养得起一个佣人,主要劳动均由老母亲承担,“老母寡居,手挽幼弟,与诸姊妹治井灶之事;为生平未有之劳焉”(年谱)。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康有为便跟随祖父康赞修到了连州。祖父康赞修对孙子的抚养非常尽心,尤其注重康有为在学习上的成长进步。在祖父教导培养下,康有为阅读了许多典籍,诗词文章大有长进,人生观在这个时期也开始形成。

“既孤三月,遵从先祖于连州官舍,连州公日夜摩导以儒先高义、文学条理,始览《纲鉴》而知古今,次观《大清会典》、《东华录》而知掌故,遂读《明史》、《三国志》。六月为诗文皆成篇。于时神锋开豁,好学敏锐,日昃室暗,执卷倚檐柱,就光而读,夜或中旦,务尽卷帙。先祖闻之,戒令就寝,犹待遇灯如豆于帐中,隐而读书焉。频问邸报,览知朝事,知曾文正(国藩)。骆文忠(炳章)、左文襄(宗棠)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年谱)。

14岁时,还西樵银塘乡居住。在这期间,他主要依靠自学,在伯祖和叔祖的书楼中博览了说部、集部、杂史诸书籍。他常常是手不释卷,口不离经,“日读书以寸计”。有时读书入神,头竟撞上了树干,故乡亲们又叫他“慧康”。17岁,康有为就已经“好为纵横之文,对时作诗,与兄弟乡老先辈倡和,又好摹仿古文,……始见《瀛环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年谱)。

康有为尽管幼习儒经,博览群书,也颇有志向,但他在科学的道路上却是坎坷的。直到15岁,还未中秀才。19、25岁、28岁、31岁,数学乡试都不第,直36岁,才中举人;38岁方中进士。正是由于科

场失意,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他的虚荣与名利思想,造成了他转向研习真正对社会有用学问的动因。同时,这对康有为形成那执拗而孤傲的性格,显然也是有影响的。

19岁这一年,是康有为人生的重要转折时期,一是祖父的去世,庇荫康有为的最后一棵大树倒了,他开始完全独立地闯荡人生;二是这一年康有为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娶张氏为妻;三是从这年起,康有为决心“谢绝科举之文,土芥富贵之事”,转治经世致用之学,投学粤中大儒朱九江(名次琦)的门下,“以圣贤为必可期”,“以天下为必可为”。

康有为在朱老师门下学习非常认真,十分敬重这位硕德高行,博极群书的老师。“先生壁立万仞,而其学平实敦大,皆出躬行之余,以末世俗污,特重气节,而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先生动止有法,进退有度,强记博闻,每议一事,论一学,贯串今故,能举其词,发先圣大道之本,举修己爱人之义,扫去汉宋之户,而归宗孔子”。(年谱)在朱九江指导下,康有为熟读背诵了《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以及《汉书》、《楚词》、《文选》、杜诗和六朝文等。经过学习,康有为的思想经历了大的飞跃过程,通过对自己过去的学习内容和生活历程的反省,用批判态度对待学习,解剖社会的习惯开始养成。一次,康有为同老师朱九江谈论韩愈(昌黎)。康有为对这位老师十分推崇的人大不以为然,指出韩愈道术浅薄,所著文章“皆空疏无有”。他觉得,“言道当如庄荀,言治当如管韩,即《策问》言医,亦成一体,若如昌黎不过文工于抑扬演溯,但能言耳,于道无与,即《原道》亦极肤浅,而浪有大名,千年来文家颉颃作气势自负,实无有知道者。”为此他遭受了朱老师的批评,说他太张狂。同学们也被他那如此蔑视“权威”的傲气所震慑(年谱)。由此他获得了“狂生”的绰号。

康有为的学习颇有个性。有一次听课时他闭目伏案,案头倒放着一卷《三国志》,被九江先生所发现。朱老师风趣地批评说:“你在

闭目例看《三国志》吗？”有为坦然答道：“是！”接着，他便将倒翻开的两页书一字不漏地背诵了出来。另一次，九江先生带领弟子过西江去瞻仰苏东坡当年南贬时遇风泊舟的古迹，惟独康有为不愿同往。同学们问他，他说：“逆流之舟，何用瞻仰？我要看的是王荆公的改制台。”这既表明了他对王安石的钦慕，同时也表现出他的固执。由此同学们又称他“粉康”。在大量阅读基础上，康有为开始了深刻的反思。为了探索人生之真谛，他经历了艰苦的求索过程。

“至秋冬时，四库要书大义，略知其概，以日埋故纸堆中，汨其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因弄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忽绝学捐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同学大怪之。以先生尚躬行，恶禅学，无有为之者。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问然而哭，忽思有亲不事，何学为，则即束装归庐先墓上。同门见歌哭无常，以为狂而有心疾矣”（年谱）。

显然，这是康有为思想激烈动荡、傍徨时期。面对中国的现实，过去的信念受到了冲撞，新的信心正在萌生，这不能不是一个痛苦而情绪非常不安的过程。这正恰如康有为自己所述：“此《楞严》所谓飞魔入心，求道迫切，未有归依之时”（年谱）。

几年的学习，给康有为的一生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其理学政学之基础，皆得诸九江”；“生平言学，必推次琦”；“粗闻大道之传，决以圣人为可学而尽弃旧学，自此始也”（年谱）。

1879年春，康有为回到家乡，决定前往山水幽胜的西樵山白云洞，读书养性，希望能在大自然的熏陶和道佛之书的引导下，摆脱焦躁不安心绪，同时让思想自由驰骋，以寻找真理的本，求魂气之灵。在这里，康有为面壁长斋静坐累月，“专讲道佛之书，养神明，弃渣滓。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芳草，临清流，修柯这云，清泉满听，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普极乐，皆现身试之。始则诸魔杂沓，继则清梦皆息，神明超胜，欣然自

得。习五胜道，见身外有我，又令我人身中，视身如骸，视人如豕”（年谱）。

尽管如此苦读，但康有为仍未找到满意的答案。恰在这个时候，翰林院编修张延秋的到来，为康有为的治学面向社会架起了桥梁。当张延秋同四五位文人学士游西樵山时，就碰上了这个衣履不整、披头散发、自歌自哭自笑的康有为，并且还同这位性情急躁、傲气十足的青年人发生了激烈争吵。但“素以文学有盛名。于京师”的张延秋并未责怪康有为，相反却认为他有个性，谈吐不俗，因而“盛称之”。回广州后，张君逢人便说：“来西樵但见一土山，唯见一异人。”从此，广东士大夫开始知道，西樵山有个康有为，而且性格狂、怪、异。为了感激张延秋的雅量，高傲成性的康有为竟写了一封情文并茂的信给张君，张、康造结成忘年之交。

康有为开始走出西樵山，经常往返于乡村与广州之间，拜张君，访学友，看社会，励志向。张延秋成了自朱九江话又一个深深影响康有为的人。“自是来城访张君，谈则竟夕申旦，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掌故，皆得咨访焉。张君聪明绝世，强记过人，神锋朗照，谈词如云。吾自师九江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献之传”（年谱）。正是在张延秋的指导下，康有为接触到了近代维新思想，使他朦胧地看到了冲出世俗社会，寻找新生活道路的曙光。由此可见，张延秋不失为康有为的政治启蒙老师。

康有为的思想渐渐清晰了，他决心“舍弃考据贴括之学，专意养心，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在这以后，康有为除了反复研读《周礼》、《王制》、《太平经国书》、《文献通考》、《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典籍外，还开始研究西学，“既而得《西国近事汇编》、一李回（圭）《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年谱）。这无疑对康有为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李圭所著《环游地球新录》，深深地

吸引了康有为,书中所描写的新世界和新事物,使他异境顿开,产生了走出国门去看一看的念头。

1879年底,康有为兴致勃勃地来到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一些新事物。“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年谱)。在香港,他还参观了赛珍会(博览会),看了欧洲戏和马戏团的表演,心灵深处的封建文化积淀开始发生动摇,感到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确实优于古老腐朽的封建制度。于是康有为开始萌发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念头。“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年谱)。

从香港回来后,康有为学习更加勤勉了。据说当时他每天早上抱一批书,往桌子上一放,右手拿着一把锋利的铁锥子,猛力向下一扎,锥穿两本书,就读两本书,锥穿三本书,就读三本书,每天不读完这“一锥书”,决不休息。以至于后来他由长期坐着读书,缺乏身体运动,影响了血脉流通,臀部长“核刺”,多年一直流水淋漓,给他带来很大痛苦。

1882年5月,康有为第一次来到北京应试(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应试和以后的各次应试,均是在康有为长辈们的强迫下参加的)。此行尽管没有及第,但却使他增长了许多见识。他游历了祖国南方的一些大城市,尤其是上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年谱)。

据说当时康有为从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一下购走西学译著达3000余册,为当时该局售书总额的四分之一强。回到家后,康有为更加发奋攻读西方书籍。凡西方的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以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耶稣教义等无所不读,“新识深思,妙悟精理,说读仰思,日新大进”(年谱)。当时康有为就是这样饥不择食地去吸取西方文化,以期能从西方找到救国富民的良药。这恰如毛泽东曾

经指出的那样：“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论人民民主专政》）

经过长期痛苦的求索，尤其是大量接触了西方文化和目睹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繁盛以后，他与其他先进的中国人样，认识到这样的道理：“要救中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同时，康有为又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找到了战斗的武器。

康有为尽管曾经在朱九江门下受到过“经世致用”之学的熏陶，但从总的看，康有为所奉之儒学，仍属于古文经学的范畴。从1884年起，康有为通过对传统文化的长期筛选与鉴别，终于下决心摒弃宋学和古文经学，而转事今文经学。

“二十七岁（1884年）而尽读汉、魏、六朝、唐、宋、明及国朝人传注考据义理之说，所以考求孔子之道者，既博而劬矣。始循宋人之途辙，炯炯乎自以为得之矣。既悟孔子不如是之拘且隘也，继遵汉人之门径，纷纷乎自以为践之矣。既悟其不如是之碎且乱也。苟止于是乎？孔子其圣而不神矣。既乃离经之繁而求之史，凡数千年国家风俗治乱之故，若者与孔教相因而进退者，得之于战国、秦、汉之间，东汉为美矣，以为未足尽孔子之道也。既乃去古学之伪，而求之今文学，凡齐鲁韩之《诗》，欧阳、大小夏侯之《书》，孟、焦、京之《易》，大小戴之《礼》，公羊、谷梁之《春秋》，而得《易》之阴阳之变，《春秋》三世之义”（《礼运注叙》）。

1890年初春，康有为在广州会见了今文经学家廖平，受到很大启发，觉得今文经学的“三统说”和“三世说”，就是可以通经致用“微言大义”。康有为认为，陆、王心学虽“直捷明达，活泼，有用”，但不及今文经学“灵活”；佛教哲学虽讲“慈悲普渡”，但“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康有为传》）。于是在廖平的启发引导下，康有为彻底完成了由古文经学到今文经学的转变，并且很快完成了著名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从而正式奠定了他维新变法运动的理论体系。

(二) 投身变法 报国图强

对世界的认识明确了,出于拯救中国的历史责任感,康有为犹如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义无反顾地向穷途末路的封建势力发起了进攻。他创办学堂,传播变法图强思想,为维新运动培养干部骨干;他多次冒死上疏光绪,呼吁治定国是,立即变法,其呐喊之烈,震耳发聩;他积极为推行变法而奔走,办报纸、组学会,为了变法维新事业,不惜流亡国外16年……

创办“万木草堂”

康有为非常重视教育事业,他把开办学堂,培养人才,作为进行维新运动、拯救中国的重要手段。他感到,在一个民智未开,人才奇缺的国家,要从事维新变法,改造社会是不可能的。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必然要伴随一场大的文化教育运动,思想解放运动。故康有为认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南海康先生传》)

1890年春,康有为举家迁往广州,居住在祖传老屋“云衢书屋”,开始了传道授业的生活。

康有为办学的招生办法很特别,他不举行一般的人学考试,而是举行“面试”。考生无论年龄大小、学力高低,只要能通过康有为的“面试”就可以入学。“面试”时,康有为同应试者进行严肃认真的谈话。通常是康有为主动向应试者介绍自己的政治学术思想,猛烈抨击汉学、宋学和八股训诂词章,指责教育界的积弊,宣传孔子改制等一套新说。凡能接受他这惊世骇俗之论的,即予录取。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入学考试”,在康有为周围就聚集了一大批有思想,忠于他学说和事业的门生。

康有为的开门弟子是陈千秋。陈千秋当时就读于广州五大书院之首的学海堂的高材生,是一名颇有爱国热情的青年。他十分仰慕

康有为敢于冒死上书皇帝,请求变法的大无畏精神,故特登门求教。很快,陈千秋就被康有为的思想和博学所征眼。于是他退出学海堂,正式科拜康有为做自己的老师。

经陈千秋的介绍,梁启超成了康有为的第二名学生。当时梁启超的身份比康有为高,与生活坎坷的康有为相比,梁启超真可谓是春风得意。8岁学诗文,12岁补博士弟子员,成为少年秀才,17岁中举。但他在听了康有为的独到见解后,毅然决定放弃举人之尊,拜倒在一个前生的脚下受业。也许正因为梁启超有如此务实的胆魄,才使他在历史上成了与康有为齐名的伟人。梁启超记下了他与康有为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扶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推陷廓清之。自辰人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文,且疑且惧,与通市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三十自述》)

随后,不少有志青年如徐勤等闻风而至,学生人数骤增至20余人,云衢书屋显然无法容纳了。1891年春,康有为便将学堂迁入长兴里邱氏书屋(今广州中山4路长兴里3号)这是一座前后三进的大院,大厅宽敞明亮,是个理想的办学讲课之地。长兴学会,这个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的第一个摇篮就这样诞生了。在这里,年方34岁的康有为“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年谱)。

1893年冬,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学堂又迁至广府学宫文昌殿后的仰高祠。康有为正式给学堂命名为“万木草堂”,其意以树人如树木,寓培植万木,为国栋梁之意。“万木草堂”的建立。标志着康有为教育救国的实践进入了新时期。此时康有为名声鹊起,一从游

者岁增,动至数百人(《万木草堂始末记》)。全盛时,万木草堂是“学者大集,乃昼夜会讲”(年谱)。

万木草堂在办学方针上,注重了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康有为特别“重精神,贵德育”(《康有为传》)。《长兴学记》中,康有为要求学生要有“四耻”,即“一耻无志”,“二耻循俗”,“三耻鄙吝”,“四耻懦弱”。“若有四者,不能学道,愿深耻之”。康有为经常鼓励学生,要仿效勇于献身国家富强的先辈,培养救国救民的使命感,责任感。据梁启超口忆,康有为“每语及国事机理,民生憔悴,外海凭陵,辄慷慨歔噓,感至流涕。吾侪受其教,则振荡怵惕,凛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南海先生七十寿言》)。在讲课时,康有为精神十分饱满,旁征博引,贯通中外古今,一讲就是半天,其声音之宏亮,如狮子吼,如黄河流,诚可谓诲人不倦的一代师表。学生们从康有为身上,直接学到了济世救民新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范。

智育方面,康有为主张以孔学为中心,认为“百家皆孔子之学”,“诸教皆不能出孔学之外”。“必知孔子改制《六经》,而后知孔子之道”(《万木草堂口说》)。通过这些教育,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和奠定知识基础。同时,康有为也很强调经世致用。当时所开设的有关经世致用的课程有: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用学和群学。康有为希望通过中外历史的分析总结,以作为维新变法的参考。康有为还很重视西学,他要求学生学习泰西哲学,万国史学,研究万国政治,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及其自然科学。康有为规定,他的学生要读西洋译述百数种,以此来打开学生的眼界,架起向西方学习的桥梁,从而为国内的维新变法服务。

为了培养学生具有健康的精神和体魄,万木草堂还首创了音乐舞蹈、体操、射击等课程,注意学生的全面发展。

教学方法上,康有为注意教法的活泼多样。除了课堂上系统传授知识外,他还十分重视提倡学生自学,为此专门设立了图书馆,名